

□ 史桂芳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得到认可，确保其“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为阻止日本的过度膨胀，构建有利于美国的远东太平洋秩序，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以实现“雄飞”大陆的梦想。

借一战时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国家卷入战争，给日本带来了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随即出兵山东，先后占领济南、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西段。日本占领山东后，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其核心是要巩固在“南满”的权益，铲除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列强要重新规划战后国际秩序，和平会议即将召开。日本也参加了巴黎和会，其参会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诸岛的权益。日本认为：它要求这些权益是正当的，因为日本靠自己的武力将德国势力从山东驱逐出去，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理所当然。而中国代表则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立即归还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等要求。美、英、法等国当时正在酝酿成立国际联盟，日本代表提出：如果日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就不在讲和条约上签字，也不参加国际联盟。于是，为了拉住日本，英、法表示支持日本的要求，美国也担心日本不参加国际联盟而向日本让步。列强最终在山东问题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日本没有取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法理”依据，巴黎和会也没有来得及构建一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新秩序。

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扩张在华利益

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肆扩张，大力扩张军备，大有“独霸”太平洋之势。日本势力迅速膨胀，引起了列强特别是美国的不安。为阻止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政治控制，1919年5月，由美国提议组成了美日英法新四国对华借款团，迫使日本停止一战期间对华的政治借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巴黎和会上

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任外相，提出“协调外交”政策，“尊重各国的正当权益”，在与列强“协调”中维护和扩大日本的权益。币原外交一度被日本视为“软弱外交”。其实，币原外交的目标与军部并无二致。“协调”并不是软弱，而是在“协调”中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满蒙”的特殊利益。其实，币原喜重郎一方面标榜“协调”外交，一方面对内积极“协调”军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军事为后盾实现外交上的“协调”。日本在高唱“协调”外交时一直在寻求机会，“协调”中有“强硬”，要实现大陆政策的目標。

1927年4月，田中义一担任日本首相兼外相，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在同情中国人“正当期望”的同时，与“列强保持协调”。田中外交依然在华盛顿体系框架内进行，但是，田中外交包含着更多的“强硬”因素。6月27日—7月7日，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对华政策的基调是“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支那本土和满蒙相区别”，将满蒙作为“日本特殊地带”采取与中国本土不同的政策，核心是满蒙的“特殊权益”。同时提出“对中国国民的希望给予同情，并与列国共同努力促其实现”，表示仍然坚持与列强的协调与信任，同时强调“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在国防上、国民生存上有重要利害关系”“万一发生动乱波及满蒙，导致治安混乱，侵害我特殊权益，无论来自何方，我将采取断然措施”，表

明日本虽然没有放弃“协调”口号，但是，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维护在华权益。1928年4月，日本直接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6月初，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日本加快了“独占”中国权益的步伐。

1929年7月，币原第二次出任日本外相，强调“增进帝国与列国的关系，政府将推进相互通商及振兴企业”。为避免列强对日本扩张的反感，币原提出暂且搁置“满蒙悬案”。在中国关税自主问题上，与列强一样表现出积极态度，1930年5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

发动侵华战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1930年经济危机波及日本。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社会矛盾激化，也成为日本冲破华盛顿体系束缚的契机。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指出的：“经济危机导致凡尔赛体系烟消云散，经济危机破坏了外交安定的基础，所有国家都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时刻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武力侵占东北。当时，欧美各国正在忙于应付危机，苏联正在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中国则处于内战之中。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所言：“如果沈阳事变是人为阴谋，这阴谋所选择的时机，真是胜算。”

破凡尔赛体系，德国于1933年10月宣布退出国联。日本与德国不约而同地要在东西方打破现存的国际秩序，建立自己领导的国际新秩序。由此也看出，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几个大国分赃与妥协的产物，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

1937年7月日本在卢沟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是中国并未屈服，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对华声明，首次公开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日本由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发展到建设自身主导东亚新秩序的“立”的阶段。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认为，“现在东亚形势发生新变化，以事变（指卢沟桥事变）的概念原则来处理现在和今后的事情，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不能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这是日本第一次公开批判九国公约、修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原则。日本推行积极的外交方针，加快建立新的国际秩序。1938年12月22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呼吁“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经过日本御前会议和政府声明，明确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内容和原则，昭示着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彻底否定，在排除欧美列强的幌子下，确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

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就政府的外交方针发表了讲话，他提出，“根据皇道大精神，首先确立日满华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将大东亚新秩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此后，“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为日本建立国际新秩序、推行扩张政策的代名词。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日三国相互配合在欧亚分别挑战英美等主导的国际秩序。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进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实施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也化作泡影。

一战前后，日本经历了从“协调”到“强硬”外交的转变，从参与国际体系到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一战前后日本对国际秩序“破”与“立”的过程，反映了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与利益冲突，而列强姑息日本、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利己”政策，更助长了日本打破国际秩序的野心。



大势在握

□ 崔庆



秦至惠文，羽翼渐丰，斗志不减，献公、孝公的治国方略和制度建设持续转化为发展成果，推动秦国进入发展关键期。

商鞅之辨

谈到秦惠文王，避不开商鞅。商鞅对秦有大功，自不必细说。但到了孝公末期，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改革旗手，已是坐拥十五座城邑的商君。当时，贤士赵良应邀和商鞅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商鞅“今君左建外易”，热衷独揽大权，所行之事“非所以为名”“非所以为教”，并劝说商鞅退还商於十五城的封邑，不要贪图权力富贵，退归林下，以保平安。

秦变的核心是要创造集中、统一、高效的国家，而不是封君自重的“联邦”，为此秦君都可以走向变革的祭台。正在人生巅峰的商鞅，对赵良的“迂腐之见”不以为然，还是我行我素。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变法的推动力，不知不觉变成了自己曾经憎恶的既得利益者，阻碍了改革的继续深入。

有一个事实令人深思：商鞅死后，惠文王一朝，入秦的各国人才源源不断。公孙衍、张仪自不必说，陈轸、魏章、乐池都来为秦效力。六国之士不是飞蛾扑火，惠文王诛杀商鞅

并非一己之私，秦国在锻造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上持续探索。

步步为营

方向是发展的首要问题，定力是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惑于虚名，不惑于小利，举自己的旗，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才能行稳致远。惠文王继位的第一年，苏秦入秦求见。日后鼎鼎大名的苏秦此时还显青涩，慷慨激昂地劝说秦王兼并列国，称帝而治。惠文王少年老成，沉稳对答道：“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文理未明，不可以兼并。”苏秦十次上书，均未被采用。

有人替苏秦抱憾，有人说苏秦后来暗地为秦工作，还有人说文王王刚刚诛杀商鞅，痛恨说辨之人。从秦国的整体战略角度出发，或许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惠文王的思路。如果说秦国的崛起有路线图，那么梳理献公以后的秦国发展历程，大致有一个“三步走”的总体方略。第一步，削弱魏国，尺寸必争，分化三晋联盟；第二步，南取巴蜀，广地富国，增加战略纵深；第三步，制衡齐楚，远邻近攻，渐成雄立之势。苏秦游说惠文王，好高骛远，直接跳跃进入最后阶段，头脑清醒的惠文王岂能听之用之。

渡河而击

惠文王时代，秦国正处在由第一步战略转向第二步战略的关键阶段。秦献公、孝公坚定不移地和魏国在河西角力，连败魏军，取得了相对优势。惠文王继位后，乘势而为，对于魏国又拉又打，既来自魏国的夫人为王后，又重来自魏国的公孙衍为大良造，开展对魏的猛烈攻势。

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2年），公孙衍率军北上，试探性攻击魏国的河西重镇雕阴。山雨欲来风满楼，次年魏国割让阴晋求和，并改名“宁秦”。可惜“宁秦”无法让壮心不已的秦国停止下来。惠文王七年，秦军再次兵临临晋，歼灭8万魏军，基本清除了魏国在河西的残留势力，尽有河西之地。此后魏国一败再败，把上郡15县也让给了秦国，彻底退出了黄河以西地区。

惠文王九年，秦军从河西的少梁出发，历史性地跨过黄河，渡河而击，先后攻占了汾阴、皮氏，紧接着在南线又占领了焦、曲沃，从南北两线对魏国河东形成钳制态势。三代秦王不懈努力，终于踏上河东之地，标志着秦国基本完成崛起的第一步战略。

南下巴蜀

发展的飞跃必定来自内部结构质的提升，秦得巴蜀就是一次华丽转

身。秦蜀相交，起于秦厉共公，百年之后，秦始发力。惠文王继位不久，就亲自率队开展对蜀的战略侦察，秦蜀两王相会于汉中褒斜道，全面勘查了日后秦进军蜀地的主要路线。楚国不仅在西线高歌猛进，在东线也咄咄逼人。楚威王之后，楚怀王和齐国亲善，约为同盟。公元前318年，以楚怀王为首，楚、齐、赵、魏、韩、燕、义渠合纵攻秦，兵临函谷关，虽无大碍，但震动秦国。拆散齐楚、削弱楚国成为当时秦国的主要战略目标。秦惠王迅速调整重心，实施疲楚弱楚方略。张仪备受重用，巧舌如簧，以“空头支票”诱使楚国绝交于齐，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楚怀王发现六百里商於之地是“空头支票”后，怒而兴兵，犯下兵家大忌。秦军不仅分离齐楚，还争取魏、韩两国转向支持秦国，相继在丹阳之战、蓝田之战中大败楚军，俘虏了包括主将屈匄在内的70余位楚将。屈原的《国殇》写道：“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就是感叹两战惨烈，痛心疾首。由此，秦重创楚国，完全控制汉中地带，使秦本土和巴蜀连成一片，雄视天下的格局初现。

惠文王时代，秦国始终准确把握大势，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向东、向南舒筋展骨，确立了对楚优势，解决了“成长的烦恼”。大秦这艘巨轮即将扬帆出海，平稳地驶入深海区，迎来“开挂”时代。

始谋弱楚

秦伐巴蜀，从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和楚国的竞速跑。楚国经过宣威盛